

2007 中国对日经济外交：从战略互惠到高层对话

外交学院院长助理 江瑞平

2007 年是中日经济关系和中国对日经济外交取得明显进展的一年，有两件大事最应予以关注：一是 4 月中旬温总理访日，正式就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另一是 12 月初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推出多项促进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举措。这两件大事构成 2007 年中国对日经济外交的主旋律，并将对未来中日经济关系发展产生深广影响。在此，请允许我仅就中日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经济背景，和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主要成果进行初浅评价。

中日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经济背景

去年 10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双方在北京发表《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提出要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今年 4 月温家宝总理访日，双方在东京发表《中日联合新闻公报》，进一步就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精神和内涵达成共识，并明确提出了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合作举措。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将主导未来包括经济关系在内的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向，在中国对日经济外交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在这里，我想仅就中日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经济背景谈一点初浅

看法。我认为，中日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主要经济背景，就是要扭转中日关系发展中已经出现的所谓“政经双冷”的迹象。

我们知道，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来评价中日关系，并用“冷”与“热”来把握其发展态势，最近几年的中日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其一是所谓“政冷经热”阶段。2001年4月小泉上台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首脑互访长期中断，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冰冷”状态。但中日政治关系的冷淡，并未立即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造成严重阻碍，中日经济关系依然处于“火热”状态。2001、2002和2003年，中国对日贸易分别增长了5.5%，16.2%和31.1%，递增之势十分明显，日本始终保持着中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的地位；2003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增长了20.6%。

其二是所谓“政经双冷”阶段。受政治关系持续冷淡的影响，中日经济关系也显现“转冷”迹象。其主要表现，首先是中日贸易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对日贸易占中国外贸比重下降。2003年，中国对日贸易增长速度达31.1%，2004年下降为25.7%，2005年再下降为9.9%。2004、05和06年，对日贸易占中国外贸的比重分别下降了1.2、1.5和1.2个百分点，从2004年起，日本丧失了保持11年之久的中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的地位，降至欧盟和美国之后屈居第三位。其次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剧烈波动。尤其是在2006年，实际使用金额出现了29.6%的负增长。再次是日本对华日元贷款连年减少，由2000年度的2144亿日元减少至2007年度的460亿日元，2008年

度将完全终止。最后是中日经贸合作明显滞后，在双方都在大力推动双边和多边 FTA 的背景下，在互为最重要贸易伙伴的中日之间却迄今未能启动 FTA 谈判。

中日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双边经贸关系在两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中日经济关系显现的这种“转冷”迹象，必然要受到两国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双方明确要构筑战略互惠关系，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尽快扭转这种“转冷”迹象，尽量避免在中日关系中出现“政经双冷”的局面，对两国对外经济关系和国内经济发展造成过坏影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中日双边经贸关系在双方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存在一种不太正确的观点，认为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日本经济的持续长期萧条，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地位已在发生逆转，基本趋向是“中国对日本越来越重要，而日本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

说“中国对日本越来越重要”是正确的。的确，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不断扩大开放，对华贸易投资在日本对外经贸关系和国内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持续迅速提升，“中国特需”越来越成为日本经济走出长期萧条、走向持续回升的主要动力。对华贸易在日本外贸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在 1990 年仅为 3.5%，2000 年升至 9.9%，2005 年升至 17.0%，2006 年升至 17.2%，2007 年 1—9 月达到 17.7%，中国超过美国（16.3%）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对象国！2001—06 年对华贸易对日本贸易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26%。

但说“日本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却是错误的。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对日贸易在中国外贸总量中的比重和地位在快速下降，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曾占到 1/4 左右，1985 年达 27.2%，而到 2006 年已下降到 11.8%，今年可能降到 11% 以下。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对日贸易占中国外贸比重下降的同时，中国外贸占 GDP 的比重（外贸依存度）却在快速提升。由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日本，即便中国外贸的对日依存度明显低于日本外贸的对华依存度，对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依然要明显高于对华贸易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2006 年对日贸易（2074 亿美元）占中国 GDP 总量（26681 亿美元）的 7.8%，而对华贸易（2114 亿美元）仅占日本 GDP 总量（43401 亿美元）的 4.9%，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对对日贸易的依存度，要相当于日本经济对对华贸易依存度的 1.59 倍！仅从这点看，日本对中国要比中国对日本重要得多。

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主要成果

作为落实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启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今年 12 月 1 日，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中方以曾培炎副总理为团长，7 位部长参加，日方也有 6 位大臣参加。关于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情况，大家应该已有全面的了解。这里我仅想谈谈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成果，及其对中日经济关系和对日经济外交的影响。如下几点最值得关注：

第一，提升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层次。以往的中日经济合作，在官方层次基本停留在部长级别上，在中国虽也有外交部、财政部、发改委等多个部委参与，但基本是以商务部为主的，在日方则基本以经济产业省为主。而此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则将官方层次提升到了副总理级，在中方由曾培炎副总理担任团长，日方虽因体制问题，由外务大臣任团长，成员却包括了财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农林水产大臣、环境大臣和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等，级别也与中方基本相当。

第二，完善了中日经济合作的机制。以往的中日经济合作，参与的相关部门虽然在不断增多，但大多是“各自为政”、“单打一”，未能形成相互沟通与协调的稳定机制，这与有关中日经济关系的各个领域相互交叉与融合的客观趋势极不相称，也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而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则将双方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首长集中在一起，形成了稳定的协调与沟通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有关参与部门之间的统筹布局、协调配合和多方互动。

第三，深化了中日经济交流的内涵。伴随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扩展与深化，两国经济走势与宏观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强烈。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再局限于商讨双边经贸关系中的问题，还对各自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直接对话。会间曾培炎副总理全面介绍了中国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看法和经济发展思路。双方共同发表的《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新闻公报》明确指出：“……鉴于两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双方确认应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推进经济政策的运行。……中方认为，日本

走出流动性过剩问题引发的泡沫经济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日方对中方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方针表示欢迎。……中国强调促进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三者平衡稳定发展，并介绍了相关措施，中方认为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双方将继续加强政策交流。”

第四，拓宽了中日经济合作的领域。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明显改变了以往中日经济关系主要集中于双边贸易、日本对华 FDI 和日本对华 ODA “三驾马车”的状况，除了将双方协调合作领域扩展到各自的国内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外，还商定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以及中小企业等多个领域加强务实合作。

可以预见，伴随中日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推进和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继续，已经趋冷的中日经济关系有望逐步回暖。在此需要关注的是，中日贸易增长速度连续放缓的势头已经得到扭转。按中方统计，中国对日贸易在 2006 年增长了 12.5%，比 2005 年提升了 2.6 个百分点，2007 年 1—10 月增长了 14.0%，又比 2006 年提升了 1.5 个百分点。

另外，作为 2007 年包括经济外交在内的中国对日外交的收官之作，12 月 27 日至 30 日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将应邀访华，其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和中国对日经济外交的影响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